



陳
寅
恪

与
中
国
文
化
精
神

刘克敌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刘克敌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34-5192-9

I. 陈… II. 刘… III. 陈寅恪(1890~1969)—思想评论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203 号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

刘克敌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50千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192-9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7445)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朴学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

——陈学入门管窥

- 3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一瞥
——读《柳如是别传》
- 15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王国维与陈寅恪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漫谈
- 27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
——从龚自珍到章太炎再到陈寅恪
- 42 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
- 49 大师的失误
——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漫谈
- 57 花落春仍在
——陈寅恪论传统文化的力量与价值
- 77 “取珠还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及改造
——陈寅恪谈中外文化
- 92 对对子与中国文化精神
——略论陈寅恪的语言研究
- 105 谈鲁迅与陈寅恪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 115 “颂红妆”与《红楼梦》
- 127 《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的才女情结
- 131 “事如春梦了无痕”
——陈寅恪笔下的中国近代史



第二辑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

——陈寅恪之学术传承及师友交往

145 陈寅恪之师承及其与西方学术思想关系漫谈

150 钱穆笔下的陈寅恪

——读钱穆的《师友杂忆》

157 《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

165 陈寅恪与新文化运动

179 “钱唐真合是吾乡”

——陈寅恪先生的“杭州情结”兼谈与朱师辙的交往

188 从“南柳北陈”说起

194 梁漱溟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第三辑 “改男造女态全新，鞞部精华旧绝伦”

——陈寅恪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205 千古文人国师梦

209 陈寅恪为何感慨

216 由王国维推崇汪元量看王氏悲剧

221 私人讲学：文人最后的舞台与家园

228 从文人的占卜与相面说起

233 “国谁之国，友何处友？万事伤心，一朝脱手！”

——吴宓在1952年

241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略论陈寅恪的知识分子观

257 奇异的比较

——文人与妇女

278 后记

第一辑

“朴学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

——陈学入门管窥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一瞥

——读《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之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群体的全景图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毫无疑问，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人以及滋生他们的土壤即江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的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①

①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五），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3页。



今人胡晓明对此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①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仅对以柳如是为代表的“红妆”给予热情赞颂，而且对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也有着深入分析并带有明显的偏爱之情。由此可以说明，陈寅恪在1949年后之所以多次流露出想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看来不仅是由于其父兄归葬于此的缘故，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江南诸城市中他特别对杭州感兴趣，则不排除还有另一位陈寅恪赞颂过的杭州才女陈端生的因素。此外，由于钱谦益和陈子龙二人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因此对他们二人思想及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他们日常生活和仕宦生涯的展示，也就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评价。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而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者，并因此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并把它们与文人、“红妆”之性格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分析。如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又如“红妆”之代表柳如是，其人果然聪明绝伦，不愧一代才女称号，但她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则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

^① 胡晓明：《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①

可以肯定的是，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家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地理环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较为自由的生活。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灵活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合之前，数年间仅凭一船来往于江南地区，江南水乡特有的这种船文化，无疑对她帮助很大。不同于陆上之车，船本身除却交通功能外，还可以承担居住生活功能，这就使柳如是以免除寻找住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此外，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如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广泛为之宣扬，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就江南城市而言，杭州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自南宋时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后，到明末杭州已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西湖及其周围的名人府邸、客栈等更是形成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中介人物。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二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多有相似。这里所强调的是，在历史变迁之际，他们的命运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多有关联、互为因果。今人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①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就当非无意之举，意在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自然，影响文人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时代变迁无疑是最重要之一，特别是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对文人心理的冲击更是巨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文人之性格命运与时代变迁之关系，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名议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②

显然，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

① 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等各类文人的精彩表演以及不同结局，而且陈寅恪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更注意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其所以如此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此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①

通常，人们只注意陈寅恪的第一段话，其实我以为第二段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文人对时间流逝一直极为敏感，对个体生命的相对渺小无助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情怀，而这一点极大影响着他们的人世情怀和避世心态之转换，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之所以花费极大精力考证钱柳因缘，就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论述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其在婚姻爱情和事功方面的各种表现，并最终展示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命运，给出自己的解释。

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据陈寅恪所言，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是屡遭挫折。就年龄而言，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该看淡。那么，反过来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次年钱谦益即娶柳如是为侧室，而且是按照“匹嫡”之礼（即按照与娶元配夫人同样的礼节）举办婚礼。不过，此举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和道德规范，导致许多文人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士大夫表示不满。请看《柳如是别传》中引用之有关史料对此事的记载：

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蟠发，合盞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褻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①

其实，柳如是对于和钱谦益的结合，是有所顾虑的，除却两人的年龄差距外（柳氏此时仅24岁），还有一点就是出身卑贱的柳如是一直想要一个名分，按照陈寅恪的推测就是“当为嫡庶之分”。陈寅恪认为，在明末，这个问题之寻求解决，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社会礼节，这方面只要稍微通融，即不成问题；一是国家法律，则不容含混，以至违反（一夫一妻）制度。但二者之间，其实互有关系。^②按照当时社会风气，士大夫嫖妓纳妾本不是问题，但在明清时期，如要同时有两个正妻，则既不能为世人所容，也是违反国家法律之行径。在此之前，士大夫因此受到连累事不是没有。据《明史·倪元璐传》，倪元璐在崇祯八年升国子监祭酒，且深得皇帝信任，为此深受同事温体仁嫉妒，温体仁在搜罗倪元璐所谓罪行而不得之情况下，遂以倪元璐之正妻尚在，而其妾王氏竟然冒充继配受封以致败坏礼法事为由诬告倪元璐。后经其同事证实得知其原配陈氏已因过被出，王氏系继娶而实非其妾。但无论如何，此二人同载登科录却是不争之事实，最终倪元璐被罢免官职，此事才算结束。

陈寅恪指出，钱谦益和倪元璐本同为温体仁之流所深恶者，幸好钱柳结合之时，温体仁已经死去，不然按照钱柳结合时其原配夫人仍在钱家的事实，则钱谦益所受处分很可能会较倪元璐更加一等。自然，由于当时钱谦益已经被罢官回家，其嫡妻陈氏所受封号当被追夺，也就无法为柳如是请封，由此在国家法度方面已没有任何通融可能。陈寅恪指出，也就是为此方面之不能满足，钱谦益才在能够通融之社会礼节方面大加铺张，以弥补安慰柳如是不能被封的遗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1页。

②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37页。

憾。至于清兵入关之后，建国之初，则法律制度不似明代那样严格，甚至有士大夫之正妻已受明代诰封，而其妾可以代妻受清代之封事。不过，就在这一点上，足可看出钱柳二人在民族气节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含糊：尽管钱谦益仕清时有机会为柳如是请封，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们的结合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钱柳二人却我行我素，相亲相爱，婚后生活极为幸福，这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钱氏的“合欢诗”及“催妆词”等。作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还要求众门生以及好友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以为庆贺。而从是否唱和以及是否认真唱和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文人对钱柳因缘的态度。对此陈寅恪有精彩的分析：首先，看和诗的作者构成，其年龄较大者，一般为近于山林隐居之人，或者是地位不甚显赫者，其余则都为钱谦益的门生或晚辈。由此陈寅恪指出，钱谦益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在当时确实不能为舆论所容，因此其门生中一些最有地位者甚至与钱谦益为患难之交者如瞿稼轩等，均没有和诗，恐怕是有所顾虑之故。其他一些有和诗者，其质量也平平，除却其作者能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他们有敷衍之嫌。其次，陈寅恪注意到，对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作为最重要当事者的柳如是竟然没有唱和之作。对此陈寅恪的分析是认为这反映了柳如是的矛盾心理，即如果唱和之作表露欢乐之心境，就似乎对不住故交陈子龙；如果说一些悲苦之言，显然也对不住钱谦益，有无理扫兴之嫌，如此干脆就不写为好。

笔者以为陈寅恪的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还可以补充的是，柳如是自然充分了解到当时社会一般议论以及钱氏家庭对他们结合特别是结合方式的反对，以及钱氏为此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她的地位因此有些尴尬，她的内心自然有些不安，也即过于表示欢乐或者不欢乐都不太好，或者说对钱氏表示安慰或者歉意似乎都不好，如此那就不如不写和诗。进一步说，柳如是认为，既然钱谦益能够为她牺牲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社会地位等，那么和诗与否已经不重要，或者她认为钱谦益也不会看重。不过，按照陈寅恪的意见，其实钱谦益还是有些失望的，那么，聪明如柳如是，难道真的是没有看出钱谦益的失望还是其他原因呢？陈寅恪最后也没有得出定论，我们也只能姑且猜测一番了。



钱氏降清，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对此失节之举，陈寅恪并没有为之辩护，明确指出钱氏当时之表现，远不如柳如是，是文人软弱无行之可耻代表也。而出身卑贱之柳如是，反倒在此重大关头，决意投水自杀殉国，诚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最有力之注解，可歌可泣。对柳如是而言，夫君成为降臣，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即如何处理对丈夫的个人忠诚和对故国明朝的政治忠诚。对此，柳如是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态度，而是采取逐渐在钱谦益内心灌输复明念头的方法。^① 笔者以为，柳如是对于中国文人的弱点和所谓的使命感，其实非常了解，所以才成功地说服钱谦益为“赎罪”而开始复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降清后一般文人对他的态度极为微妙，除却一般社会舆论的嘲讽轻视咒骂外，许多江南文人均未因此与钱氏绝交，或者在政治上轻视钱氏而在文学方面保持交往。其中最为理解钱氏如黄宗羲者不必论，其余多少窥知钱氏内心委曲者反而更加深了与钱氏的交往，如归庄、朱鹤龄、瞿式耜等，对此今人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精彩分析，不赘。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江南民众可歌可泣之反抗的大背景下，在史可法、陈子龙等人壮烈牺牲之时，钱氏之降清好像没有受到应有之“千夫所指”的诅咒，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此外，赵园认为明亡之后，书写“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为当时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决不仅仅限于那些遗老遗少。甚至在那些失节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读到似乎更为深切而动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显然，书写者的政治态度和处世观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在这里，共同的审美思维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体验并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的那些失节分子，可以表示出一种有限的宽容乃至理解。就钱谦益个案而言，钱氏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华和成就以及文坛领袖身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其他文人对其失节行为的谴责。自然，还是有文人对此表现得清醒和坚定不移，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到的有人在钱氏投降后对其服装的嘲讽，讥其为“两朝领袖”就是一例。

①（美）高彦颐：《闺塾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至于钱柳之死，从江南文人的反应及社会有关舆论，更能看出那时一般文人的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作为降清之臣，钱谦益晚年从事的复明运动，当时很少为他人所了解，所以钱氏之死不会受到当时江南文人的特别关注，更少有悲痛悼念之辞，是可以预料的。而对于柳如是之被迫自杀，江南文人及社会舆论却几乎都给予同情，这里的是非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

三

明末清初之士大夫，颇类魏晋时文人，多有喜空谈而无实际能力，既标榜“苦行”又追求奢侈生活，喜谈兵而无实际战争经验等矛盾现象，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对此多有嘲讽。如钱谦益本为士人领袖，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或者说只限于纸上谈兵，所谓“共检庄周说剑篇”是也。却每每以将帅之才自命，而时人居然也认可此人所谓将帅之才，如陈子龙就曾极力推荐钱氏出将为相，不可不谓奇事一桩。陈寅恪认为：造成士人中如此风气之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于明末时局紧张，朝廷急需人才以挽救大局；从文人主观方面说则在于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以及明末特殊的“亡国亡天下”之社会危机给文人带来的深刻心理刺激。只是在当时，即便是弘光帝这样的孱主，也能看出这些文人的华而不实，并没有重用他们，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至于那些本属堕落或人品低下之文人如阮圆海等，也夸耀自己的所谓将领之才，就更加可笑之至。对此陈寅恪评价说：此“亦可窥见明末士大夫一般风气。阮圆海钱牧斋范梦章三人者，其人品本末虽各异，独平日喜谈兵，而临事无所用，则同为一丘之貉耳”^①。可为定论。

当然，导致那个时代之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种种避谈现实而崇尚“空谈”风气之原因，还在于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大的不信任和迫害，以及整个社会所弥漫的那种“戾气”，必然导致文人走向要么以所谓的“苦行”甚至自虐式折磨谋求内心的安宁，要么以堕落所导致的内心愧疚感换来对所谓使命感的追求。就江南文人而言，因地理家庭因素等，其生活状况大多比较优越，更容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68页。



易以“醉生梦死”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绝望。陈寅恪所激赏之诗人吴梅村就自诩说：“青溪白石之盛，名姬骏马之游，百万缠头，十千置酒。”^① 对此，作为江南文人领袖的钱谦益，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世态人心有这样的描述：“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啖，鸟以两首相残。”^② 至于钱氏本人，身为文坛领袖，也未能免俗，心胸不够开阔，对此陈寅恪在该书中也多次给予批评。当时文人所以如此，寻根求源，则与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之多方面迫害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有直接关系。相对于有宋一代，明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还不如元代。今人赵园曾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引用明初时文人苏伯衡的论述对此进行过分析。苏伯衡比较了元、明两代当政者对文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元代统治者对文人根本就不看重，所以其地位固然低下，但因其不受重视，故真正遭受官方迫害者反而不多。而在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似乎非常重视，其实不过是“假借”而已。所谓“假借”，就是把文人当作工具，那就用得着时重视，用不着时忽视甚至抛弃之。赵园进一步分析说，其实，对于统治者而言，与其“假借”之，不如“困折”之，因“困折”之后，文人再有什么想法例如谋反之类，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可能了。

陈寅恪从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出发，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对明清易代所导致的中国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而钱柳等一代风流人物的命运不过是中国文化命运的缩影而已。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王朝更迭频繁，而每次王朝变迁都会产生社会动荡，并且严重影响甚至危及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承担文化延续之重任的文人又必然遭受冲击，导致其内部分化。而文人之处世态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其悲喜荣辱之不同命运。明清易代一直号称为“天崩地坼”，文人的道德气节在此历史关头都要经受严峻考验，其不同结局在令人唏嘘不已之余，也许就成为驱使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在动机吧。

实际上，清朝初年，大多数汉族文人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科

① 《吴梅村全集》，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9页。